

2020 年《新史學》宋史研究 專號導言

鄧小南、黃寬重*

我們很榮幸應本年度主編李卓穎教授的邀請，為本期宋史研究專號寫導言。

以專號形式組織學術論文，《新史學》做過不少嘗試(例如「女/性史專號」、「宗教與社會專號」、「疾病、醫療與文化專號」等)，由於議題相對集中，出自不同視角的論著、研究討論與書評，得以凸顯主題意義，頗獲佳評。在我們印象中，以特定斷代史的研究設為專號，似乎還是首次。這種集優良文稿而非刻意安排的呈現方式，顯示出國際範圍內宋史研究者的執著努力。¹

宋代歷史的研究，與其他斷代史一樣，面臨著「出新」的強烈壓力，拓寬視野、深化議題，是對學界與學者的重大挑戰。30年前《新

*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員

¹ 又如，2019年6月，上海中西書局出版了包偉民、戴建國主編的《開拓與創新——宋史學術前沿論壇文集》；2020年4月，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、澳門大學《南國學術》編輯部在澳門聯合發布「2019年度中國歷史學研究十大熱點」，「宋代文官政治的特徵與影響」赫然在列。(網址：<https://www.must.edu.mo/news/32959-article04281719>，擷取日期：2020年11月10日。)

史學》創立時，倡導「以前瞻、開放、嘗試態度研究中國歷史」（發刊詞），這一追求，就是面向挑戰的應對。同樣的，目前宋史學界也在集體回顧研討的基礎上，反思歷史進程，反思研究方式，以求創新前行。²

本期所收的文章，集結了宋史學界老中青世代的研究成果。其中有材料議題出新的努力，也有嘗試新的研究範式的努力。5篇文章分別探討宋代史學編纂史、祠祀信仰空間、儒士知識形態、碑記敘事策略、文本特色分析等議題；儘管選題各異、關注點不同，都在反思中嘗試尋求「新」的研究取徑，同時力避空疏瑣碎。即便是個案討論，也試圖突破既有的簡單認識模式，寓含著整體的思考與觀察；其背後的深層關懷，尤與時代的政治及文化特性相關。

我們討論的「歷史」，實際上都基於歷史記載。研究格局出新，有賴於材料的拓寬、深耕與理解方式的轉化。本期各篇論文都是從不同體式的資料中提煉出見解，如對文獻的深度解讀並與政治發展脈絡聯結，或結合文集、筆記資料，探討祠祀信仰空間、儒生術士交流；利用文獻中不同文體，探討地方社會的運作範式及各種勢力的交互關係，呈現基層社會的立體面貌；乃至結合文獻與資料庫，探討史學的論述範式。凡此種種，都是立基於對史料的透析，提出具新意的觀點。

對於「書寫」的關注，是本期論文的特點之一。蔡涵墨(Charles Hartman)教授指出，身為史家，我們既受困於史料，也受困於史料流傳至今的過程。正因為存在這樣的警惕，本期文章中，無論針對特定類型的文獻、官方典籍，還是民間文本的研讀與詮釋，多涉及「書寫」的內容及傳世史料的樣態。或許值得提出的是，我們對於「書寫」內

² 或許可以與此構成呼應的是，即將出版的 *Journal of Sung Yuan Studies* 從歷年論文中選出數篇「經典性」文章，正準備以回顧專號的形式紀念其建刊 50 週年。

在意涵的複雜性，對於文獻／文本產生的特定環境，對於書寫者的理念認知及其筆下的疊加、渲染、塗抹乃至留白，對於不同文獻的屬性特質、完整程度以及適宜討論的問題界限，應予充分重視，否則容易陷於格套，失於表淺。換言之，研究者的目標不僅在於指出書寫者政治動機、道德立場對文本內容產生的影響，還應該透過對於「書寫」內容切實的分割、解析、溯源、比勘，推進對於相關史料及相關問題的實質性認識。

同樣，利用文本資料的數據進行統計比較，有助於激發新的觀察視角及啟發性的研究成果，但史料的性質與叩問的方式亦值得斟酌。宋代沒有一部貫通前後、結構完整的《會要》，《永樂大典》所收，相當於有關內容編纂的「合訂本」；《輯稿》則是清人輯錄而成，的確不是「穩定整齊的宋朝政府記錄」。就數據統計而言，重複的部分可以篩除，若能對處理文獻闕失部分的方式提出解釋或說明，當更有助於理解此類研究的價值。

此外，以地方文獻、碑記等為主要材料的討論，若能與實地田野考察或社會傳統結合，當能對民間運作方式有不同的認知，並延展出新問題。同時，在聯結文獻內容與議題時，如何進一步貼近政治環境的變化，並結合時序與脈動，關照全域，提出更周全的論述，而非僅從單一視角去詮釋文獻，刻意突顯「創新」的觀點，或許也是學界在追求新與變的學術風潮中，值得進一步反思的課題。

目前的研究，對於長時段(例如「週期性」等)逐漸攬入視野。而兩宋始終與北方政權互動共存，有對立有交往，這一格局深刻影響著歷史根本性的走勢。即便就宋代內部而言，方方面面的生長與周折，亦與憂患帶來的壓力與激發相關。我們的研究，需要更加開闊的視域。相信新生代的學人會有新的眼界與成就。